



美国动态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2011年7月20日（第11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IMF 高层变动

IMF 前总裁卡恩遭性侵指控之后，总裁一职缺位，先有一位美国籍副总裁代理，6月28日，法国财政部长拉嘉德成为 IMF 首位女性总裁。另据报道，拉嘉德正考虑任命前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担任新设立的 IMF 副总裁一职。

（来源：《华尔街日报》网站 2011 年 6 月 29 日，2011 年 7 月 7 日）

美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将提交预算议案

美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康拉德（Kent Conrad）暗示他将于下周提交 2012 财年预算建议，在公开该议案之前，他将把它提交给民主党党团。该议案希望在十年内通过减少支出和增加收入，减少赤字 4 万亿美元。

（详见：Patton Boggs Capital Thinking Updates 2011 年 7 月 4 日）

美财政部长盖特纳考虑辞职

据报道，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将在国会和政府就增加预算限额达成协议之后辞去现任职务。盖特纳警告说，如果国会在 2011 年 8 月 2 日之前不能把 14.3 万亿美元的债务限额增加的话，美国就会冒无法履行义务的风险。盖特纳对媒体表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仍将待在财政部。

（详见：Patton Boggs Capital Thinking Updates 2011 年 7 月 4 日）

穆迪给 61 家中资企业插红旗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Inc.)周一（7 月 11 日）发布报告，给予 61 家受评中资企业“红旗”标示，称在投资者对这些企业的公司治理担忧不断加剧之际，该评级机构希望提高其评级方式的透明度。

（详见：《华尔街日报》2011 年 7 月 12 日）

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令美国担忧

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Mike Mullen）说误判会极大地加剧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美国对此继续表示担忧。马伦周五（7 月 15 日）在日本表示，他此前对中国的访问是建设性的，但指出美国将继续表达对中国国防建设的关切。

（详见：美国之音网站 2011 年 7 月 15 日）

重点关注

美媒密切关注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发展态势

据《纽约时报》网站 13 日报道，中国经济出乎意料地在第二季度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环比上一年度, 经济增长率为 9.5%), 但是与前一季度相比稍微放缓了一些。该增长指数稍显放缓, 但是仍然超出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专家的预测, 且此种放缓本身是在中国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的预计结果之内。

针对近年来日趋严峻的房地产和物价形势,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采取了逐步紧缩的货币政策来进行控制, 例如提高利率等措施对通货膨胀势头进行反击。

国外专家普遍认为, 中国经济如果“硬着陆”, 所造成的结果对于世界其他国家都不是利好消息。加拿大皇家银行 (the Royal Bank of Canada) 香港分部的分析师布莱安·杰克逊 (Brian Jackson) 认为, 中国经济放缓情势稳定; 澳新银行 (ANZ Bank) 的一位经济学家刘立刚 (音译) 认为, 中国经济前景良好。

依然严峻的是中国的通胀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 6 月份消费价格环比上涨了 6.4%, 包括猪肉在内的日用消费品价格上升得更加迅速。通胀已引起了包括温家宝在内的政府高层领导的重视。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称, 过去一年以来的调控措施已经有效地使得国内经济发展摆脱了 (部分是由于抗拒 08 年全球经济萧条所采取的经济刺激措施而造成的) 过快增长, 一些行业的发展放缓已经反映了这一趋势,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经济更加健康稳定的发展。

文章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专家的观点, 认为将来经济的不稳定性主要在于如何平衡刺激经济发展措施的效用和防止通货膨胀, 例如在货币措施的采用方面如何既保持健康的资产流动又要防止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来源:《纽约时报》网站 2011 年 7 月 13 日)

中美两国欲协调彼此的军事战略

在本周的三天中国之行期间,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 (Mike Mullen) 上将与他中国同行友好地交换了彼此的承诺, 以增进脆弱的两军关系的可靠性。

中美之间军事关系的紧张源于中国近年来的军事现代化。

中国最近确认它的第一艘航母即将下水, 并将建造更多的航母。中国正在暗地发展隐形战机、先进的潜艇和射程达 1025 英里的海基导弹等武器。除了潜艇以外, 所有这些军事发展都出现于今年, 此前, 中国军方还发射了 7 颗侦查卫星。

一方面, 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的行为可以理解。与美国一样, 中国遍布全球的商业足迹和对燃料、原料的需求给中国发展军力保障国家利益提供了合法性。当中国的实力扩展到美军主导的地区, 分析家说中美之间的广泛合作对避免双方的敌对行为和误判非常关键。两国之间这种不情

愿的同盟说不定会带来一些好处。

另一方面，一些美国的分析家把中国军事设备的更新视作制约西太平洋美军势力的一种关键性的努力。以此种观点看来，反舰导弹、航空母舰和中国正在发展的其它尖端武器是为了对抗美国海军的第七舰队，该舰队已称霸太平洋水域超过半个世纪。

中美对双方的军事行为存在着不同看法，美国对中美军备竞赛所存在的财政问题也表示担忧。

（来源：《纽约时报》网站 2011 年 7 月 14 日）

（编译：江宏春、余居道）

焦点分析

2012 政治大选年来临之际美中面临的战略大挑战

加布·柯林斯（Gabe Collins）和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Erickson）*

在中国即将过渡到下一届领导层以及美国蓄势待发备战 2012 年总统选举之际，有必要梳理一下两国为彼此所带来的战略机遇与挑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问题将是美国 2012 年总统选举中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政策问题，特别是由于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之一洪博培是美国前任驻华大使。

中国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国会竞选的热点问题。来自内华达州的共和党人马克·阿莫德（Mark Amodei）试图将政府开支与一则广告短片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盛顿街头行进的画面联系在一起，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在这则广告短片中，一位中国电视播音员向听众讲到：“美国自身成为美国最大的敌人。举借国债耗尽之际，美国依然维持着失控的政府开支。奥巴马总统不断提高债务上限，美国的自主性变成了一种新的依赖性。美国债务攀升，我们的财富增加，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国家（指中国）如何复兴的。”

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政治和商业研究中心主任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教授告诉我们说：“在 2010 年中期选举时，有 250 场竞选使用了有关中国的广告宣传片，指责对手过于亲华。在我看来，这些广告片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也没有影响到最终的选举结果。我们可以期待看到更多广告片的出现，但是依然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具有政治牵引力。”

不管怎样，中国和美国都是各自最为重要的外交关系伙伴国，为彼此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最大的挑战。部分外交政策挑战源于以下事实：和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不同的是，当今中美两国都离不开对方，由于两国缺乏明确的外部危险，即使存在一些，也不足以促成两国间真正意义

*安德鲁·埃里克森和加布·柯林斯，“洞察中国”（China SignPost™）的创办人，十多年来在政府、学术机构和私营机构等进行中国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埃里克森博士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U.S. Naval War College）副教授，担任普林斯顿—哈佛中国和世界项目研究员。柯林斯先生是研究中国和俄罗斯的商品和安全问题专家。“洞察中国”网站（www.chinasignpost.com）旨在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向那些生活广泛受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发展影响的人们提供高质量的中国问题分析和政策建议。

上的合作。

好战的前苏联曾让美国感到恐惧。如今，贸易、货币升值、环境污染控制等问题，甚至是恐怖主义问题，从某种程度上也不足以令北京和华盛顿方面感到恐惧、让它们有种紧迫感进而采取统一行动。同时，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在许多核心利益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不可能达成统一意见，这其中包括在中国宣称为自己专属经济区的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美军未来的相互交流问题。随着中国日益强大，中国与美国达成和解的有限意愿——尤其是在亚洲问题上——将会进一步减弱。

认识并评估各种挑战已经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因为此时此刻，各种各样事件的发生（其影响将决定未来几年的战略前景）正促使这样一种战略框架的形成，那就是它将决定未来十年亚洲博弈的风起云涌。中国、越南以及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摩擦愈演愈烈，原因之一就是各方都想确立对有争议地区的主权，同时阻止对手得到这一主权。

本文简要地介绍了在即将到来的政治过渡和竞选中北京和华盛顿方面需要努力面对的 12 个挑战。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合作前景，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政治制度和目标上的本质差异，尤其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必将在两国间造成摩擦。

中美关系的“新常态”日益表现为以下情形：中美关系依然面临挑战，但是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口水战不同的是，这些挑战更多是受到政治操控，同时对彼此的国家利益将产生更多的直接影响，因此绝不可以回避，也不会那么容易解决。例如，南中国海地区的航行自由、中国维持与伊朗和朝鲜的交往、以及中国富有重商主义性质的贸易和经济政策。

华盛顿方面面临的、将会影响与中国关系的各种挑战

1) 总的来说，与大多数美国人相比，中国的政治家们更喜欢“亦敌亦友”型的中美关系——有竞争，也有合作。在一些特别问题上，美国肯定能够与中国合作，但是美国与中国之间建立的关系不可能是像其与亚洲盟国日本、韩国那样的合作伙伴关系。一个更加现实的目标是实现某种形式的“竞争性共处”。

2) 美国的外交风格相对缺乏耐心并且旨在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中方谈判人员表现出任劳任怨、专注过程的姿态，这便产生了摩擦点。对于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挑战，中美两国政府在采取“国际上负责任的行为”方面将仍然无法达成共识。

3) 美国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将是安抚像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其他一些东盟成员国，使它们相信美国将维持并可能强化其对亚太地区的关心与关注，同时尽量避免过分对抗中国。美国的外交舞步（得到可信的军事力量的支撑）雅致微妙，但是更加稳健的美国存在丰富了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手段——正因如此，美国的存在也成为了一股维持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力量。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还需要考虑到的一点是，与美国不同，中国没有正式的联盟伙伴国来分担国家安全负担。另外，中国选择的一些“朋友”，包括像巴基斯坦、伊朗、缅甸和苏丹这样的国家，作为自然资源供应国或贸易伙伴国对中国是有帮助的，但是从整个国家安全层面考虑，它们实际上是中国的

负担——尽管它们也会提供一些好处，例如巴基斯坦能够帮助中国牵制印度。这些现实情况促使中国产生了一种国际孤立感，害怕被别国包围。

4) 大选期间，货币升值和反倾销指控将有可能出现。只要美国的经济依然深陷就业岗位缺乏的泥沼，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就将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中，人民币升值将是一个热点问题。另外，中国对美国的钢铁、钻管、轮胎和其他商品的出口容易在美国国内激起声势浩大的产业游说和反倾销指控，并有可能导致中国对自美国出口的商品实施报复。另外，我们认为美国重工业基地的“空心化”将成为围绕中国所进行的相关争论的关键议题，尤其表现在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等工业州的国会竞选中。

5) 尽管美国面临经济上的大挑战，但是中国也面临着一些更深刻的经济和人类发展结构问题，例如一些顽疾可能会促使下一届领导人更多地关注国内问题，并采取更加有力的对外政策，以确保得到所需的资源和政治支持来应对国内挑战。

6) 抛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的军事行动，在美国的战略未来中，从真正意义上讲占主导地位的将是亚太地区，而不是中东地区。美国需要关注中东地区主要是为了维持和平并保证能源供应不受干扰（避免出现消极影响），但是亚洲地区当前的事态以及未来前景要求美国介入其中（产生积极的结果）。美国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中东国家，但是它却是，并且必须依然是一个亚太国家。

北京方面面临的、将影响与美国关系的各种挑战

1) 中国正在努力抑制通货膨胀和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人口压力和经济力量不断推升着中国的通胀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美国的贸易和经济政策需求越来越不能接受中国日益高企的通胀和劳动力成本。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老百姓必须认识到这一点，那就是尽管美国在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但是它不可能对每一个决策的制定产生决定性影响——“并不是每一个决策都与美国相关”。对任何一个拥有自治权的大国来讲，首先要考虑的当然是国内问题。

2) 美国的经济政策将如何影响中国所持有的大量美债？中国会大刀阔斧地实现外汇储备的多样化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吗？如果希腊和西班牙持续的经济问题或其他因素导致美国经济放缓，北京方面必将采取行动大量减少其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数量。这一点很难准确衡量，因为中国政府已经购买并将继续购买大量的美国国债和其他金融投资工具，其中有些是直接购买，有些是通过其他途径掩盖了实际的所有权。虽然这些举措反应了对持有美国金融资产的信心，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即通过“幌子公司”卖掉所持美国金融资产，如果其他交易方随后认识到中国一直在减少所持美国国债，这将可能带来市场冲击。不过，这样的举动如同滴入水中的一滴血，会导致其他美债持有者减少持有量，由此给美债和美元价值造成大麻烦。

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显示，截止到 2011 年 4 月底，中国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高达 1.1 万亿美元，意味着在国外所持美国政府债券总额中，中国的持有量占了四分之一。中国所持美国政府债

券构成了中国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因此北京方面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就是不稳定事件或一系列连锁反应事件危害其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的价值。与此同时，中国也有一些手段应对这一问题，因为中国有能力把钱花到其他方面，例如购买自然资源和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资产，或是从事附加的“资源贷款”交易，这会带来比美国金融资产更高的收益率。简而言之，在华盛顿努力寻找途径控制联邦预算赤字和不断上涨的国债之际，北京方面所持有的大量美国政府债券为中国提供了谈判桌上的大筹码。

3) 对希望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开放市场。过去三年里的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是中国政府制定的一些“本地产品”的采购要求和措施使得许多外国公司被迫离开之前充满活力的中国市场。许多中国国内的企业有可能利用其对当地市场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中胜过外国同行。在这种背景下，放松限制会发出积极的外交信号，又不会让大量的中国市场份额流入外国公司手中。

4) 处理台湾问题。大陆与时俱进的发展及其对台湾的经济拉动作用会促进和平、共赢的解决方案的出现，但是这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同时，台湾问题已经成为中美政治竞赛的中心议题，未来一年半的时间里，中美政治竞赛应该竭力避免将台湾问题进一步扩大化。

5) 中国如何处理与邻国的海上纠纷，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纠纷？如果中国继续强硬地声称主权并妨碍邻国进行资源勘探，那么就有可能刺激东亚和东南亚形成更加明确的反华安全架构。在地区争议问题上欺凌弱国（很多情况下这些地区并没有勘测出大量能源或矿产储量），与北京官方描述中国为和平的崛起国、其首要任务是“和平发展”相矛盾。尽管不可能爆发全面的战争，即使是和越南也不可能，但是我们还是预见中国会以不太明显的方式施加压力，包括经济制裁/贸易惩罚以及使用非军用舰只驱逐国外船只并逮捕渔民。这可以被描述为“在桌底下踢仗”，即使双方在正式场合面对面而坐时似乎仍保持外交上的谨慎。

6) 北京方面会采取行动主导中国黑客对美国的网络袭击吗？中国通过互联网审查制度、网上监督以及控制所有相关的路由器创建了引人注目的互联网“长城”，而北京方面却否认有能力追踪并确认在中国境内活动的黑客，这无疑让人很难相信。同时，黑客袭击的目标为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及主要的国防承包商——这些公司的数据类型对更青睐银行和信用卡信息的个体网络犯罪分子不具有多大的价值——这提升了推诿的难度，因为中国努力使他国相信这些黑客并不隶属于中国政府。当前美国国防部正在讨论是否应将某些网络袭击看成是战争行为，这传递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美国政府正在认真思考网络安全问题。

简而言之，北京和华盛顿在相互打交道的过程中面临全面的外交政策挑战，更不用说它们所面对的其他重要的外交关系了。美中关系存在一些短时间内很难跨越的桥梁，例如极大地改善双方的军事关系，我们建议双方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其他一些领域，这些领域内的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利益层面，并且被政治化的程度相对较低。

未来可能达成合作的新领域

一基础设施。美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已经过时并且常常负担过重，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对当前美国交通基础设施的评级为“D”。相比之下，过去十年里，中国一直在快速地更新并扩建其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基础设施。尽管有人质疑中国如此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上是否是合理的，但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坍塌的桥梁以及大多数地铁区严重的交通堵塞证明美国亟需更新基础设施，但是美国却没有像中国那么做。中国投资于美国的高速铁路项目将会给双方带来实际的好处。

一推进双边投资协议。中国有大量的资金，并且越来越想成为一个主要的对外投资者。美国向中国的投资者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投资于房地产、农业和工业领域。但是，需要制定一套规则，明确规定哪些领域可以投资，哪些领域不欢迎外方投资，因为包括信息技术、航空航天、至关重要但易受破坏的基础设施（电信、输油管道、电网）以及资源（战略矿产品、稀土元素）等在内的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有理由限制国外的投资。在投资协议谈判过程中，美国应该寻求具体明了的规定以及透明的美国在华公司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机制。国会对与中国的双边投资协议的消极反应成为一个主要挑战。

一改善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外交接触以帮助中国寻找改善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的途径应该是首要考虑的问题。2011年5月，在北京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强调指出，尽管中国的个人电脑市场规模几乎等同于美国，但是微软在中国的软件收入仅为在美国的二十分之一。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盗版活动猖獗。更进一步看，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预估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改善将给美国对华贸易带来多达1070亿美元的价值增长（超过2010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并给美国额外创造210万个就业岗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也有明显的好处，因为如果发明得不到保护，就很难实现国内创新。

在13亿人口中，中国肯定有属于自己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但是他们必须能够从他们的知识突破中盈利并投资发展他们的想法。没有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国最具创业精神的发明者可能会认为硅谷要比中关村更适合把他们的想法进行商业化，而这种商业化正是北京方面希望在自己的领土上形成的经济活动。在该领域的外交努力需要阐明中国国内越来越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并强调要协调美国、全世界以及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目的是努力阻止未来的专利滥用行为以及滥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来保护中国的公司。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推动创新。

一确保希望在中国销售商品的外国公司拥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舞台。2011年6月底，中国政府宣布将放宽限制，这些限制严重阻碍了外国公司获得中国政府的采购合同，尤其是科技领域的合同（《中国日报》）。尽管地方和省级政府如何遵循这一改变依然有待观察，但是考虑到中国政府每年1万亿美元的采购市场，此举无疑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开端（《金融时报》）。从外交上讲，下一步顺理成章是通过外交努力说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该协议规定：“一缔约方（批准该协议的国家）对其他缔约方的产品、服务和供应商所给予的待遇应该不低于对本国产品、

服务和供应商所提供的待遇，也不低于对任何其他缔约方的产品、服务和供应商所给予的待遇。”该协议还规定缔约国“不能以外国所有权的程度来对在本国建立的供应商区分对待；不能以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国为标准而歧视本地的供应商。”包括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欧盟 27 个成员国在内的 39 国政府签署了该协议，中国目前为协约观察国。

（来源：“洞察中国”（China SignPost™）网站第 40 期 2011 年 7 月 11 日）

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它们已经成为历史。

菲尔·安吉里德斯（Phil Angelides）*

人们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我们的金融市场遭遇大滑坡的 3 年后，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已经很明显。华尔街——以胜利者的姿态伸展着手臂——正朝着终点线冲刺，而数百万的美国家庭正为了生存而奋力挣扎。随着华尔街似乎已将胜利掌握在手中，它也正着力改写历史。

处于经济金字塔顶部和底部的人在财富上的差距极其巨大。这个国家最大的 10 家银行现在掌控着全国超过四分之三的银行业资产。华尔街那些上市公司的利润已经反弹了，然而 2010 年对它们的补贴却达到了创纪录的 1350 亿美元。

与此同时，有 2400 多万的美国人正处于失业或找不到全职工作的状态，近 9 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消失。似乎这场危机的引发者与那些为之付出代价的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

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详细阐述了金融行业的草率冒失以及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的严重失误，这导致我们的经济在 2008 年末遭受重创。自今年 1 月份委员会的这份调查报告公布以来，其准确性以及事实依据未受质疑。

所以，关于是什么导致金融危机的证据已经如此充分而所论之事又才发生不久，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如何去修改对历史事实的陈述？可你和你的政治伙伴就是这么做了。你们孤注一掷地相信一句老话——“真理未出门，谎言传千里”。

如果你是众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你对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的联邦预算赤字每年激增 1 万多亿美元这一事实不予理会。赤字增加量的三分之二是由经济衰退以及两党为提振经济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直接导致的，对此事实你也视而不见。你不去关心造成赤字的真正原因，相反将当前的预算问题与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的长期挑战混为一谈，这样你就能破坏社会保障体系。

如果你是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你背离了自己在 2008 年的感悟，那时你承认对

*菲尔·安吉里德斯，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 FCIC）主席，主持美国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进行的官方调查。

于在监管上实行放任政策这一思想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崩塌感到“惊愕和难以相信”。现在，你指责改革的做法，称之为“近来‘无所不可’（anything goes）的监管之风”——可笑的是，这话倒让我们想起你在美联储时失败的政策。简而言之，在你把经济之车开到了悬崖上之后，你又开始教人开车了。

如果你是摩根大通（JP Morgan）的投资总监，你所说的与你们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2010年向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所作的陈述相反，当时他将大型金融机构的问题归咎于“管理团队的完全责任而……非任何其他人的责任。”你们改变了自己先前关于金融危机原因的看法，转而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政府的住房政策。而这一新想法的来源是：由公司资助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位顾问提供的过时数据，而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已对这些数据作了分析并揭示出真相。

如果你是国会中占多数的共和党议员，你对大范围信贷滥用导致全国各地居民遭受损害这一令人痛心的历史视而不见，还誓言除非削弱新成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的职权，否则将阻止任何人就任局长一职。你们对普遍的信贷过剩导致我们的金融市场受损这一事实置若罔闻，对那些因限制过度信贷而受到指责的监管机构，你们还试图减少对它们的拨款。你们全盘否认已经犯过的错误，还设法阻止为改正错误所作的努力。

历史事实重要吗？当然重要。

一直这样罔顾事实下去将使我们偏离需要达成的目标：检举金融领域的过失以防止今后犯错；大力实施金融改革以防止风险过度；根除华尔街的利益争端、管理混乱以及存在严重问题的补偿机制。

最糟糕的是，这样下去将使我们偏离改善就业以及为美国的未来创造真正的财富这一当务之急。过去十年，我们将数万亿美元浪费在过度投机上，而不是将这些钱用于能够提升我们的生产力和经济实力的投资活动上——比如在技术、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教育方面的投资。在企业利润方面，金融行业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15%上升至21世纪初的33%，而金融业的负债从1978年的3万亿美元猛增至2007年的36万亿美元。上千万人尚在失业，现在进行经济转型——从基于“钱生钱”的经济转变为以“钱创造就业机会和真正的繁荣”为基础的经济——难道不是正当其时吗？

我们仍然能够改正错误并避免在将来犯错，但是时间正在流逝。

（来源：《华盛顿邮报》网站 2011年6月29日）

（王子磊、郝玥译，吴其胜校）

编辑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编辑： 郝玥
通讯地址： 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社联大楼 203 室
邮编： 200020
电话： 53064520
工作邮箱： meiguodongtai@163.com